越南警察「管得寬」

曹正方

東西走廊

前些日子，我隨公司優秀員工一行參觀了越南首都河內胡志明陵墓。胡志明是越南人民的革命領袖，是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創始人和締造者。爲了紀念胡志明主席，越南黨和政府在巴亭廣場修建胡志明陵，永久保存胡志明的遺體，以供後人瞻仰。

據導遊說，胡志明陵墓由蘇聯專家設計，其建築風格是列寧陵墓和越南民族風格的糅合，外牆使用了名貴的花崗岩和大理石，內部使用了越南多種名貴木材，整個陵墓顯得宏偉、莊嚴。胡志明陵墓正門陵簷上刻着有金黃色的越文「胡志明主席」。大門兩邊站立着兩名警察，神情平靜。輪到我們瞻仰時，軍樂響起，越南軍人面向陵墓立正，行軍禮，衆人也自覺地面向陵墓肅立默哀。儀式結束後，我們一行在陵墓工作人員的帶領下，排着隊，緩緩地步入陵墓。進入陵墓內，躺在透明水晶棺中的胡志明遺體呈現在我們眼前。他面色紅潤，儀態安詳，陵墓氣氛莊嚴肅穆。在胡志明水晶棺的底下四個角，分別站着四名穿着白色制服的警察。他們的帽簷剛好與水晶棺齊平，他們手握鋼槍，神情很嚴肅。在參觀過程中，沒有人講話，咳嗽，空氣凝固了似的。快結束時，我背着手，漫不經心地朝四周觀望。這時，一名越南警察走過來，把我從參觀的人流中拉出來，表情嚴肅地對我嘰嘰咕咕地說了幾句。我嚇得不敢出聲，半天緩不過氣來。公司領導見到我被越南警察扣住，趕緊過來給他們打手勢，問發生了什麼事。我忐忑不安地解釋：「沒有啊，我眞的沒有做什麼。」過不多時，當地的一名導遊趕了過來，用流利的越語跟警察解釋着什麼，警察才同意放我走。導遊告訴我，參觀胡志明陵墓時，雙手要垂直放下，不允許背着手，這樣是對領袖的不尊重。

雖然這次參觀的過程只有短短的幾分鐘，但是氣氛莊重，使人敬畏，令人難忘。

忘不了《青年文友》

許定銘

醉書亭

我的少年時代在一九六〇年代初。那時候，我們沒電腦、沒電視、沒遊戲機，甚至連收音機、麗的呼聲，也要等鄰居開了，站到人家門前或窗下「竊聽」。我的課外知識均來自閱讀，尤其是一些專供青少年作課外補充的雜誌讀得最多，此中最忘不了的，是《青年文友》。

《青年文友》是十六開約三十二頁的綜合性半月刊，內容有國學研究、科學新知、攝影、連環圖、遊戲、文藝……等多項。而最吸引我的，是它的問答遊戲和學生園地。常識問答比賽的內容，多是中學生能力所能解答的，每次接到問題，我都會到圖書館去翻書，很多時都要花兩三小時才能答好題，把答案寄出，然後等待揭曉的時刻，享受那種「名登金榜」的榮譽。

一九六〇年代初，香港學生文社如雨後春筍，發展得蓬蓬勃勃，很多文社人都把文章投到《青年文友》的學生園地發表，主要是它的稿費不錯，一篇幾百字的散文，通常都會有五元。在四毫子可買一本言情小說，一兩元可買到厚冊純文學創作的當年，這些稿酬是相當可觀的數目，也是我輩窮學生零用的主要來源。而學生園地也由每期兩頁而增至四、五頁，大受歡迎！

《青年文友》創刊於一九五二年初，一直出到一九六三年末才停刊，算是一份長壽的期刊。

紙面遊戲

安立志

文化什錦

似乎是一種規律，自古以來，中國的改革，往往帶有死裡求生、背水一戰、破釜沉舟的性質。魯迅早曾指出：「中國太難改變了，即使搬動一張桌子，改裝一個火爐，幾乎也要血；而且即使有了血，也未必一定能搬動，能改裝。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，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。」（《墳・娜拉走後怎樣》）正因如此，歷史上幾乎每次改革，都是在社會危機正在釀成甚或已經爆發的情況下發生的。清末變法就是在挨了八國聯軍的鞭子才啓動的。

十九世紀末葉，慈禧太后血腥鎮壓了戊戌變法，爲應對日益進逼的東西洋夷，竟然借重「拳匪」貿然向列強宣戰。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，八國聯軍攻陷北京，慈禧帶着光緒向晉陝方向倉皇出逃，樣子雖極狼狽，面子仍然風光——官方謂之「庚子西狩」。在首都失陷、乘輿播遷的危急關頭，尚在逃亡的那拉氏突然萌生了改革念頭，她以光緒皇帝的名義，於翌年一月二十九日從西安頒發了一道「變法上諭」。在一百一十一年後的今天，重溫這篇改革文獻，仍然不乏啓迪意義。

這份「上諭」，其氣勢之恢宏，分析之切要，是前所未見的。文件深刻論述了大清帝國的積弊之重與改革之亟，明確闡述了弊端之源與改革之路，可謂高屋建瓴、總覽全局。「上諭」首先從普遍意義上闡述了改革的必然性，蓋「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，無一成不變之治法。」「治法」即政治體制，政治體制是人爲的產物，人們當然可以重構或改造，「法積則敝，法敝則更」，是一條毋庸置疑的政治規則。爲了賦予變法的合法性，「上諭」也抬出了老祖宗，「我朝列祖列宗，因時立制，屢有異同。入關以後，已殊瀋陽之時。嘉慶、道光以來，豈盡雍正、乾隆之舊。」老祖宗都曾歷行改革，今日變法自然就順理成章了。

此時的清朝已不復「九天閶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」的康雍乾時代，顢頇自大的慈禧太后對外國典制之優於中國心知肚明。因此，「上諭」在闡述改革路徑時明確指出，「懿訓以為取外國之長，乃可補中國之短；思前事之失，乃可作後事之師。」應當說，十九世紀中葉的「洋務運動」也在學習外國，不過，「上諭」並不認爲這種學習是到位的，「至近之學西法者，語言文字、製造器械而已。此西藝之皮毛，而非西政之本源也。」這裡提出兩個重要概念，「西藝」（科學技術）與「西政」（民主憲政），並闡明了二者係源流與本末之關係，特別指出，「捨其本源而不學，學其皮毛而又不精，天下安得富強耶？」這說明，由慈禧啓動的清末新政，一開始就帶有憲政改革即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。掌國晚清數十年的慈禧深知改革障礙之所在，這些障礙既是文化的，也是制度的，更是利益的。「上諭」指出，「我中國之弱，在於習氣太深，文法太密，庸俗之吏多，豪傑之士少。……以拘牽文義為認眞，以奉行故事為合例，舉宜興宜革之事，皆坐廢於無形之中；而旅進旅退之員，遂釀成此不治之病。」尤應指出的是，「誤國家者在一私字，困國家者在一例字」一語，正是歷代改革歸於失敗的肯綮所在。「私」好理解，「既得利益」之謂也；「例」則應從「國情」、「制度」、「意識形態」中找根據。那麼，如何消除這些障礙呢？「上諭」給出了思路，「欲去此弊，其本在於公而忘私，其究歸於實事求是。又改弦更張以後，所當簡任賢能，上下交儆者也。」「公而忘私」、「實事求是」解決的是思想路線問題，「簡任賢能，上下交儆」解決的是組織路線問題。

慈禧痛切地知道，「法令不更，痼習不破；欲求振作，當議更張。」爲了統一思想，形成共識，她命令全體官員進行一次關於改革問題的大辯論，「舉凡朝章國故，吏治民生，學校科舉，軍政財政」，「如何而國勢始興，如何而人才始出，如何而度支始裕，如何而武備始修」，都在建議與討論的範圍。由此可見，這場改革不僅是全面的，也是系統的。要求「各舉所知，各抒所見」也並非隨意，而要「各就現在情形，參酌中西政要」，既考慮國情，也借鑒異域，體現了這個變法文件穩妥與開放的一面。

如何看待慈禧這場改革呢？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一語中的：「處於權威危機中的統治者往往會迅速的變成眞誠的改革者，他對改革的眞誠，來源於他對保住權力的眞誠。」（《轉變中的社會的政治秩序》）慈禧太后這個剛剛鎮壓了戊戌變法的滿清皇族的最高統治者，在列強的威逼之下，京城且不保，權位何能穩？她在逃亡期間頒發的這份「變法上諭」，如果說體現了她改革求變的眞誠，倒不如說體現了她保住權力的眞誠。

單從「上諭」的文本來看，態度不可謂不堅定，分析不可謂不深刻，思想不可謂不開放，路徑不可謂不明確。然而，在此後的操作過程中，卻發生了極大的變異，一則網文說慈禧的變法有「四不變」，即「三綱五常不能變；祖宗之法不能變；大清朝的統治不能變；自己的最高皇權不能變。」這則引文出處不明，難以爲據，但清廷於慈禧死前三個月（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）出台的《欽定憲法大綱》卻是確定無疑的。「大綱」共二十三條，竟有十四條強調「君上大權」，「臣民權利義務」只作附則處理。「大綱」以日本明治憲法爲範本之一，卻刪去了限制君權的有關條款，充分體現了清政府對君主權力的戀棧及對喪失權力的恐懼。受到強烈非議的是前兩條：「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，萬世一系，永永尊戴。」「君上神聖尊嚴，不可侵犯。」由此可見，清廷的改革不過是紙面的遊戲。這場昧於形勢、囿於私利的改革，爲時已晚，三年之後即被辛亥革命所否定。

厭惡

馮進

域外漫筆

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發酵美食：韓國的泡菜，中國的皮蛋，日本的納豆，挪威的發酵三文魚，西班牙的發酵香腸，冰島的發酵鯊魚，更不用說西方人目爲珍寶、中國人則視爲畏途的各類奶酪了。爲什麼甲之熊掌卻是乙之砒霜？我們爲什麼看恐怖片？勸人戒煙什麼辦法最有效？在新作《令人厭惡》（That's Disgusting）中，心理學家瑞秋赫茲（Rachel Herz）運用最新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成果探討人類特有的心理現象：厭惡，並解釋了食品好惡、兩性吸引力、道德標準和政治意識形態等各方面的現象。

赫茲指出，厭惡是人類喜怒哀樂等情感中最晚生成的。厭惡的表情在每種文化中都存在，無論種族，人人如出一轍：眼睛瞇縫，鼻子皺起，上唇緊縮，有時還伸出舌頭，這其實是我們嘗到苦味時的鬼臉。厭惡可能帶來噁心、嘔吐的身體症狀，有些人甚至會因而昏厥。在生物進化過程中，厭惡促使人們吐出含鹼、發苦的有毒食物，日後發展爲讓我們遠離傳染、致命病源的機制。

厭惡敏感度的高低因人而異，譬如，女人通常比男人、保守派比自由派、懷孕早期的婦女比沒有懷孕者更容易厭惡，但具體什麼能引起厭惡是後天習得的：我們的食品好惡就證明了這一點。我們的厭惡可以分爲「身體厭惡」，對人體的各種排泄物，除了眼淚以外，都會厭惡；「動物厭惡」，討厭軟體爬蟲、老鼠蟑螂；「病殘厭惡」，看到疾病、殘廢、畸形的動物和人類感到噁心；「死亡厭惡」，對墓地、死者遺物等敬而遠之；暈血也是一種厭惡。這些都來源於我們心理上對任何能夠提醒人類和動物的關聯，以及自身壽命有限的事物產生抵觸情緒。可是，我們也有道德上的厭惡感，例如覺得亂倫、食人、肥胖、「醜陋」、或同性戀令人作嘔，即使這些在某個歷史時期、某種文化中受過追捧。

有時候，厭惡和迷戀又密不可分。譬如，有人，特別是男性青少年，喜歡看恐怖片，那些血淋淋的場景以及由此產生的負面情緒究竟有何魅力？作者說，一種解釋是這些恐怖的場景可以讓觀衆暫時遺忘現實生活中的焦慮。當代恐怖片中性和恐怖相混合，也吸引了青少年。另外，令人厭惡的圖像讓我們念念不忘：書本裡的插圖、電影中的場景、車禍的畫面，因爲這種「良性自虐」能讓我們在安全的環境中感受刺激和愉悅。

厭惡情緒本質上是自我中心的，出於排他、自保的動機。我們對自身的排泄物並不厭惡，這種容忍態度也涵蓋了我們的家人和寵物。母親會覺得自己嬰兒的尿布比其他孩子的容易接受。妊娠早期的孕婦對於外國人、奇怪的菜格外排斥，是由於她們的身體本能地要保護胎兒不受外來物侵害。象徵疾病、衰老、死亡的事物特別惹人反感。相反，相貌端正、對稱的「美人」，暗示了年輕、健康的基因，格外吸引人，連他們碰觸過的物件也深受大衆青睞。詩經中有個小伙子對情人送的朱紅蘆葦（彤管）愛不釋手，因爲是「美人之貽，」的確很有道理。「道德厭惡」的產生，是由於某些行爲觸及道德底線，威脅了我們的既定世界觀。

因此，要說服大衆改弦易轍，最有效的辦法是讓他們厭惡、摒棄現有狀況，例如在香煙盒上印上被癌症侵蝕的肺部圖片。但是，我們也要意識到，歷史上厭惡情緒也多次被政客利用，煽動種族歧視、性向歧視的罪惡。正如作者所說，成熟者才能充分領會厭惡感的生物根源和文化涵義，而不被它盲目牽制。

米蘭大教堂（攝影）黃虹堅

麗水剪影

延靜

天南地北

世博會正在韓國南部麗水舉行，論壇結束後，我們乘高鐵從首爾出發，三個多小時後到達這座海濱城市。大約十幾年前，我曾來過這裡，參觀了幾個化工企業，但留下的印象不深。而這次走出高鐵車站，就被眼前的車水馬龍所吸引，心中不禁自語：「變化眞是很大！」

麗水在韓國陸地的最南端，處於全羅南道和慶尙南道交界處，人口三十萬，在全國城市中排位靠後。由於城市靠海，化工發展較早，水平較高，僅此而已。但自二〇〇六年取得世博會舉辦權之後，特別是近三年，在舉國的大力支援下，充分利用民間投資，大興市政和場館建設，這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。

我們來麗水乘坐的高鐵，就是爲世博會而新建的線路。韓國建設高鐵較晚，開通至今不過十年，最初只有首爾至釜山線，後擴至光州線，這次爲支援世博會又延至麗水。我雖多次來韓國，但乘坐高鐵還是第一次。車廂寬敞，座位舒適，行車平穩，特別是沿途可飽覽車外風光，是優於乘飛機之處。現在，韓國人來麗水多選擇乘高鐵，那天我們出站後頃刻裹入人流之中。

我們下榻的MVL（Most Valuable Lifed的縮寫）酒店，是爲迎接世博會興建的多個酒店之一。走進大堂，四壁銀白耀眼，彎曲的室內造型，勾勒出長長的海岸線。酒店的形狀更爲獨特，高二十九層，猶如一隻帆船，矗立海邊，等待起航。酒店係由大明企業投資，二〇一〇年七月動工，今年三月落成開始接待客人。房間也是銀白色，傢具呈鵝黃色，整潔而淡雅，憑窗遠眺，旖旎的海景一覽無餘。

麗水世博會屬認可（專業）性質，與綜合性上海世博會相比，規模要小，展期也只有三個月。但據介紹，這次世博會動員的財力物力也甚爲可觀。世博園區設在梧桐島邊，面積二百七十萬平方米，參加國家和國際組織上百個，興建場館幾十個，相關基礎工程投資達幾十億美元。以「生機勃勃的海洋與海岸」爲主題的這次世博會五月十二日開幕，李明博總統出席了盛大的開幕典禮並宣布世博會開幕。

我們參觀了主題館、海洋科技館和韓國館，各館展示的內容都與海洋密切相關。隨着巨大的影像，我們既參觀了彩色繽紛的海底，又遊覽了北極熊出沒的北冰洋，感受到海洋的無窮魅力，也懂得了發展海洋科技與人類生存息息相關。中國館的主題爲「人海相依」，沿海十一個城市參與，每個城市輪流舉辦三天活動，展出各自的特色展品。世博會園區內人潮湧動，不少外國遊客也前來參觀。

次日離開麗水，乘大巴前往光州，途經正在籌建中的順天世界園藝博覽會園區，我們又作了短暫停留。順天屬韓國中小城市，人口二十八萬，但已獲得二〇一四年世界園藝博覽會舉辦權，開幕在即，目前正在大興土木，加緊籌備。通過此次行程我們感到，韓國在首爾、釜山等大城市成功舉辦過奧運會、亞運會後，正努力推動中小城市承擔大型國際活動，以加快這些城市的發展速度，提高城市的品位和國際知名度。據說麗水舉辦世博會，可爲全市提供七萬個就業崗位，城市發展可提前二十年。順天這座不大的城市，通過舉辦世界園藝博覽會又會帶來什麼成果，不能不引人們的遐想。

從藏冰到冰棍

陸茂清

飲食男女

說到冰棍的由來，可追溯到三千年前西周時期自然冰的貯藏。

時王宮裡每年冬天都要藏冰，用於三伏天時供王室成員解暑，《周禮・凌人》：「凌人，掌冰，正歲十有二月，令砍冰，三其凌。」「凌人」，指宮中專管藏冰的職官，其職責是，嚴冬十二月鑿取冰塊，按需要的三倍貯藏。《詩經・七月》中有類似記載：「二之日鑿冰沖沖，三之日納於凌陰。」凌陰，即現在所說的冰窖。

自周以後，各個朝代的帝都宮苑，都構築有精密的凌陰。考古學家在陝西鳳翔發現過春秋時期秦國的冰窖，長十六點五米，寬十七點一米，深二米，容量約一百一十立方米。它構造精密，四周有厚約三米的隔溫牆，底鋪板岩，上有保溫瓦頂式建築。

依賴自然條件把冰保藏到盛夏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，人力物力財力消耗巨大，只有富有四海的帝王方能辦到。正因爲藏冰極難，所以珍貴異常，帝王爲鼓勵臣下忠君報國，常於盛夏酷熱時，舉行隆重的賜冰典禮。對此多種典籍中有載，如《太平御覽》：「石季龍（後趙皇帝）於冰井台藏冰，三伏之月以冰賜大臣。」又《東京夢華錄》：「自初伏日爲始，賜近臣冰四匣，凡六次。」皇親國戚、文臣武將喜得賜冰，視爲極大榮幸，紛紛上表感謝皇恩浩蕩。星移斗轉，藏冰技術漸次發展，魏晉南北朝以後，地方官府乃至民間富戶，也能建造冰窖藏冰了。到了唐朝，京師長安（今西安）等大都市出現了「賣冰於市」的冷飲店，只是物以稀爲貴的緣故吧，價錢昂貴，如《雲仙雜記》所載：「長安冰雪，至夏日則價等金璧。」能消受得起的，自然是富貴之家。

到了北宋年間，衆多的小康之家也能享受了，請看《東京夢華錄》中的記載：京都東京（今河南開封）街市，「皆用青布傘，當街列床櫈，堆垛冰雪，賣冰雪……」從這個「皆」字，可以推斷那時候賣冰雪的冷飲店不在少數，還出現了流動叫賣的小販：「京師暑伏以後，則寒賤之子擔冰吆賣，曰冰胡兒。」（《燕京歲時記》）

綜上所述，我國古代的冷飲，是從冬天保藏下來的自然冰雪，至於加工而成的冰棍，還是民國以後的事。

據傳上世紀三十年代初，北平有人突發奇想，準備了幾個圓柱形小鐵筒，裡面裝滿加了糖的乾淨水，插上一根細棍，搬進冷凍室使凍成冰，成了名副其實的冰棍。人們拿着細棍慢慢品味享用，方便而又雅觀。有商人認準這是能賺錢的商機，專事製作了冰棍銷售，果然生意興隆。

上海弄堂蘇州味

程秋生

文化經緯

早就聽說，上海的弄堂很有名，爲此，我也多次涉足上海弄堂看個究竟。上海弄堂裡有很多老房子，許許多多的文人雅士都習慣居住在老房子裡。弄堂的最大特點，就是鬧中取靜，交通便捷，走出弄堂，公交車、電車、地鐵等任君自由選擇。不過，解放前的上海，最流行的黃包車（人力車），北方人稱之爲膠皮車，此車體積很小，只要車伕抬起車把，蹭蹭蹭地往前跑，再窄的弄堂也暢通無阻。政要、商人、醫生、律師、教授、戲曲、評彈演員等社會名流一般都擁有自己的專用黃包車和車伕，不過車子比較考究，黑色的車身、六角形的車燈、踏板上還裝有銅鈴。弄堂裡要是有了幾輛專用黃包車，必然令人刮目相看。就像上世紀五十年代農民在地頭村邊見到了吉普車，大人孩子都會奔走相告：「電驢子，快去瞧電驢子！」追溯上海弄堂的起源是在一八六二年太平軍東征，幾次進逼上海城，城內居民以及江、浙一帶的地主和士紳紛紛避居英、法租界，使人口陡增，地產商活躍起來，買地皮，造房子，於是弄堂裡的老房子應運而生。上海弄堂老房子，一般叫石庫門房子。早期石庫門房子多爲「三上三下」，即正間帶兩廂。花崗石的門框，烏漆的大門，門內有個天井，正中一間是客堂，客堂後爲樓梯，後面還有「灶間」，其上一間爲「亭子間」，亭子間上有個小曬台，這就是石庫門的大致格局。能居住石庫門者當然是大戶人家了。弄堂文化則是民俗、風情的生動體現，老電影《七十二家房客》、《烏鴉與麻雀》等都是弄堂文化的縮影。

其實，上海的弄堂和蘇州的小巷相似，長長的弄堂，幽深的小巷，靜謐而又深長。所不同的是，上海弄堂裡傳來的是「阿拉」、「阿拉」之聲，蘇州小巷裡聽到的是「我侬」、「我侬」的吳儂軟語。要不，蘇州、上海都有評彈團。上海人酷愛滬劇，蘇州人也迷戀滬劇。蘇州人羨慕上海大都市流光溢彩的繁華，上海人則陶醉蘇州的清靜和閒適。上海有黃浦江，蘇州有太湖，加之兩地相距很近，古往今來，蘇州人在上海工作，掙了錢在老家買房。也有上海人在蘇州投資經商，壯大自己的經濟實力。解放前，上海奶油五香豆在蘇州很有名氣，上海老正興菜館在蘇州是很有名望的飯店。

蘇州讀書人多，秀才也多，因此小巷裡多了些書卷氣。文人造房子，當然首選石庫門。所不同的是，石庫門裡有三進四進的，也有五進的，旁邊有一條長長的備弄相連。每進房子自成一體，客堂、卧室、廂房、灶間一應俱全。房前有個天井，玉蘭、桂花、石榴、翠竹、梅樹鬱鬱葱葱，香飄四季，有的文人還築有假山，培植盆景，放養金魚，以增添生活情趣，抒發詩情畫意。從兪樾到周瘦鵑莫不如此。

不過，上海人口多，土地緊張，要擁有花園式的住宅比蘇州困難，蘇州城市小，城鄉結合部的土地多，空地大，因此，建房的條件相對好一些。儘管也是小巷，小巷裡的面積很大，所以許多石庫門就造在網師園、耦園、怡園附近，這些石庫門的書香氣息更濃，園林味道更足，這就是水鄉江南的獨到之處。上海弄堂文化蘇州味，這也許是上海受蘇州的影響，蘇州民俗風情受上海的感染，相互滲透，優勢互補的結果吧。